

聖賢堂
书系

中国谣谚民俗史

Chinese History of Folk Songs and Proverbs



王凯旋 李阳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中国谣谚民俗史

王凯旋 李阳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谣谚民俗史 / 王凯旋, 李阳著. --沈阳: 万
卷出版公司, 2012. 9

(圣贤堂书系)

ISBN 978-7-5470-2107-1

I. 中…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民歌—文学研究—中国—古代②谚语—文学研究—中国—古代③民俗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 7②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295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5mm×230mm

字 数：241千字

印 张：18. 875

出版时间：2012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庄 平 张 旭

装帧设计：刘继科

ISBN 978-7-5470-21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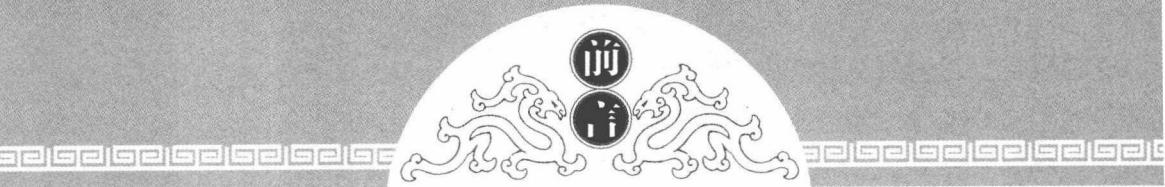
定 价：28. 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传 真：024—23284521

E - mail：vpc_tougao@163. co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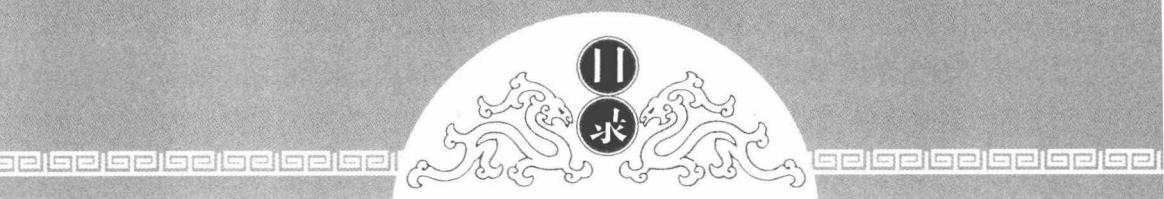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神话传说而出现的还有一种民间文学形式——谣谚。它源自民间大众的集体创作并传唱于市井民人之口。其形式虽短小但精妙，语言虽质朴却真实。在缺乏信息传播途径的古代社会中，谣谚是人们文化传承和表达心声以及传播信息的重要方式。谣谚反映的内容丰富而生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对谣谚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全面了解各个时代社会历史、人民生活及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

伴随着民俗学的出现，文化人类学家在从事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已开始注意到土著居民的语言与各种社会风俗事象的联系。作为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民俗学也将方言土语与俗语谣谚等口碑资料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事实上，世界各国民俗学的创立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发展而来，并且几乎一致地是从研究民间口头语言艺术现象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类学为谣谚民俗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在此我们将谣谚民俗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提出来，是对以谣谚为基本素材并进而探究其背后所蕴含民俗内容的一次初浅的尝试。希望以此为研究切入点尽可能多地，至少是部分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俗文化层面进行学术性的探讨和研究。在尊重历史，尊重并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下，试图再现当时民众的某些民俗习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民俗事象背后的民俗文化心理。本书实为一种学术探索之作，所涉及的题目也仅选

取了谣谚诸多内容的几个方面。

书中多处参考并大量引用了许多学者的成果，如赵世瑜先生的《谣谚与新史学》、潘洪刚先生的《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谣谚与社会政治生活》、赵瑶丹女士的《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马新先生的《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董平均先生的《论秦汉社会风尚的地区差别及其原因》等。鉴于书稿系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学术读物，故从全书体例和相关条目的写作要求出发，没有一一列举所引成果。书中的图片资料主要来源于百度图片库和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内容是笔者多年思考和研究的一些问题的心得体会，有些还很不成熟，对谣谚民俗史的研究尚属于学术尝试，笔者自视学术积淀不深，惟愿以勤补拙，如果这本小书能够唤起学术界和读者朋友对谣谚民俗研究的浓厚兴趣，即使批评有加，也仍然是值得做的尝试。愿读者诸君赐教，言祈心诚。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比较的界定与特征

第二节 比较与民俗的关系

第三节 关于比较的研究状况分析

第二章 农谚中的民人智慧

第一节 农谚的界定与分类

农谚的特征

第二节 农谚中反映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第三节 农谚中的农业文化心理

第三章 时政谣言中的为官治政

第一节 谣言中的为官之道

第二节 谣言对时政人物的品评

第三节 谣言对国家政事的见解

第四节 谣言背后的政治斗争

1	1	0	0	0	0	0	0	0	0
3	2	4	1	1	9	7	6	2	1
5	5	0	5	3	7	7	4	2	1

中/国 谣谚 民/俗/史

第四章 谣谚中的教育与考试							
第一节 学校教育							
第二节 家庭教育							
第三节 选拔与考试							
第五章 童谣研究							
第一节 童谣中的社会生活							
第二节 童谣的教育娱乐功能							
第三节 童谣与谶纬							
第四节 灰色童谣中的社会心理							
第六章 谣谚与社会世风							
第一节 谣谚勾勒下的市井生活	2	5	5	2	5	5	1
第二节 谣谚与社会风尚	2	6	0	2	5	7	1
第三节 谣谚中的民人处世理念	2	6	6	2	6	0	1
第四节 民人诉求与正统教化之间的调适	2	7	6	2	7	6	1
文献征引	2	9	1	2	8	6	1



第一节 谣谚的界定与特征



一、谣谚的界定

清代刘敏崧《古谣谚·序》说：“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论，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访于𬨎轩，故昔之观民风者，既陈诗亦陈谣谚。”这段对谣谚的论述至今仍为人们赞为精辟。原因在于它点明了谣谚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诵的大众属性，并揭示出其为统治者察民情、观民意有效途径的巨大价值。谣谚之说，古已有之。《诗经·园有桃》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中也有“曲合乐日歌，徒歌日谣”。

谣在《说文解字》中作“彖”训为“徒歌也”，又作“繇”训为“随从也”。谣的历史可追溯至远古占筮之时，《周礼·春官·太卜》中记载：“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周礼·春官·占人》中有：“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郑玄注“颂”，皆“谓繇也”。又《左传·闵公二年》中亦有：“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杜预注曰：“繇，卦兆之占辞。”

经研究发现《易》之卦爻辞有不少即由谣构成，用谣占卜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至《左传》时期仍有踪迹。《左传·僖公四年》：晋献公卜立骊姬为夫人，龟卜不吉，“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渝；一薰一莸，十年尚有臭。’”《左传·僖公十年》：“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

《国语·晋语六》中说，“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祖于谣”。这些占卜的爻辞很可能是引自古时候的已有之繇，但是，也并不排除筮卜是根据民谣改造所成。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人们用这种方式将反映民情、民意的歌谣通过卜筮的方式上升到“天意”“天命”的高度，以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也许就是谣谚用以下情上达的最初形态。

与谣的神秘色彩相比，谚的含义似乎更接近于当下我们所称之为谣谚的大众化特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谚，传言也。”段玉裁注云：“传言者，古语也。古字从十、口，识前言；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国语·越语》韦昭注：“谚，俗之善谣也。”《文心雕龙·书记》中称，“谚者，直语也。”即口耳相传之直言。

谚可能为谣之先声，因为谚的内容和形式均没有谣之完整，大多是片言只语，界定比较宽泛。因此谚可以是“传言”，可以是“故训”，可以是“善谣”，也可以是“直言”，甚至可以是历代流传下来或是当时流传的带有经验教训式的有益的格言。体现了前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的总结和人们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积淀。

无论是谣还是谚，它们都有自身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合理性。要么是民情、民意的曲折表达，要么是对某种生活经验的概括或是对生活现象的观察而得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理。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所说：“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

自然，有音无字，故其起源甚古。”那时的谣谚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和行为准则，供人们参考对照，以辨是非，教育传承。叶舒宪在《原型与跨文化阐释》中的论述似乎印证了这个假设，“人类学家们在非洲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阿朗人（Anang）族群社会中看到，谚语在这里几乎完全主宰了人们的理性思维。谚语的数量之大，使用频率之高，使它足以凌驾于歌谣、故事和谜语之上，成为口头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谚语既用做法典，用来检验习俗化的行为；又用于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智慧；还用于推理、论说、娱乐等方面。相邻的伊博人给阿朗人的命名，其含义是：在任何情况下均能机智且完整地表达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地以谚语为依据的推理竟能在当地的传统法庭判决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巫师作为最重要的文化传承者之一，对谣谚的实用性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琅琅上口的音韵和文字，便于记忆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口头解释或供随机应变的空间，使谣谚变成他们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谣谚更多地出现在占卜之中，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在意识到谣谚反映民意的同时也逐渐将其变成统治者和上层贵族的一种专利，控制谣谚的解释权，并反过来对民众施以高压影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统治者对谣谚的控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谣谚的民间性和真实性而不断传承并发展。

谣谚是什么？这个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可回避的术语不一定有西方民俗学上的对应名词。它们并不是歌谣和谚语的简单加和。民俗学中一般把歌谣归为民间口头文学，而把谚语归为民俗语言，如果这样，谣谚的归属就是分裂的。在国外，谚语与歌谣也是分离的，前者往往是片断的、短语式的，后者往往是具有完整内容和情节结构的，一般多表现为韵文；前者往往是具有警省意义的，后者内容则多种多样。明代杨慎曾作《古今风谣》和《古今谚》，实际上也是将歌谣和谚语分别对待的，前者多是成篇的韵语，诸如“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之

类；后者则多是具有一定寓意的警示语，如“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之类。晚清杜文澜所编《古谣谚·凡例》中曾论谣谚本义：“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谚训传言。”“歌者咏言之谓，言者直言之谓；咏言即长言，直言即径言。”因此把谣和谚分开来考虑的话，谣就具有歌的特性，谚具有话的特性；谣表达内容复杂，因而略长，谚表达内容简明，因而略短。由此看来，如果细究，谣谚之间还是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的。但之所以二者可以合称，也由于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在形式上或因押韵而朗朗上口，或因对仗而便于传诵，在内容上多反映一种比较深刻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无论对谣谚如何定义，它都是民众生活与思想的直接反映。诚如清人刘毓崧在《古谣谚·序》中所说：“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谣谚体现为言志之道，《风》《雅》是以诗言志的主要形式，而谣谚却是更加显著的言志形式。如果想探寻《风》《雅》的精妙，不妨先从谣谚入手。谣谚是人们心声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产物。与《风》《雅》可以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于谣谚具备以上内容与形式上的特征，使它成为民间观念在空间上传播最广、在时间上传承最久的一种语言形式。

二、谣谚的特征

在缺乏信息传播途径的古代社会中，谣谚是人们文化传承、表达心声、传播信息的重要方式。谣谚内容是生动而丰富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农业生产与节气知识、地方特点与风土人情、山川气候与人生哲理、战争与民间疾苦、官场与贪官污吏等等，可谓是社会生活的

多彩画卷。其中不少民谣今天的人们仍然耳熟能详，如“月亮弯弯照九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高楼饮美酒，几人飘荡在外头！”谣谚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归根结蒂要从它所具备的特征说起。

从内容上说，谣谚具有史料性、民俗性和文学性三大特征。从表现力和表现形式上，则具有通俗性、舆论性和广泛性特征。

（一）史料性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新史学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是所谓“眼光向下”的革命，即人们从关注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转向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文化的体察。这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1902年）和美国人鲁宾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1912年）中便已初露端倪。这是一场史学研究观念的变革，经法国年鉴学派的支持，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成为国际史学的主流；与此相类的是在中国自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便是这种史学观念变革的开始。然而，这种变革在当时中国的收效远不如欧洲，史学家如顾颉刚等人，虽然反映了一种民主的观念，但对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影响甚微，直至80年代以后，这场学术观念上的革命才再度深刻影响到中国史学界。

其次是所谓“自下而上”看历史，这正是西方所谓“新社会史”粉墨登场的背景。因为经过研究实践，史学家认识到普通民众及其文化与精英人物及其文化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日常生活与重大政治事件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就必须在发现他们之间差异的同时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同时“自上而下”地观察历史虽然是关注了民众，但却是站在上层的立场俯瞰社会百象，不免造成研究的偏差。“自下而上”则是站在大众立场，将民众的生活感受比前者表达的更为准确和彻底，二者结合起来也才能真正达到反映历史全貌的目的。

“新史学”的研究取向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开放的范式，因而，

谣谚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便得以显现。

谣谚作为来自于民间，反映大众生活和民情民意的语言样式，集中反映了民间力量和民间智慧。无论是“眼光向下”对反映民众生活资料的搜集，还是“自下而上”站在民众角度，评判历史，讲评人物，谣谚都是最集中、最本真的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

当下的口述史学者会将这样的谣谚归入口述史的研究范围，将其作为传说的资料加以提炼和分析，认为它们“更接近于历史的本原”。这种研究对历史学作出的贡献之一，就是拓宽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围，证实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出自平民；它把历史引入群体，同时把群体引入历史，使各阶层的人们建立起联系。“历史在这里更丰富，社会使命也随之变化——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

就谣谚的主要特点而言，其大众性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因而在社会史研究中，谣谚便成为支撑社会史研究的最为坚实可靠的史料来源。同时谣谚史料的多样性也传递着社会史研究的目标信息，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这一点也往往是正史和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谣谚所反映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到一般的民情风俗，从时代风貌到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从社会生活表层到人们内心世界，可谓无所不包。谣谚可为我们展示一个多层次的社会背景，较真实、较自然、较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郭沫若先生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从一定意义上讲，谣谚所展示的历史比“正史”更真实可靠，更生动活泼，更切实逼真。谣谚成为史料的重要来源，通过研究谣谚来看社会历史，会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谣谚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的史书中已有所体现。《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保存了不少当时流传的谣谚，而《诗经》的305篇中，记载地方歌谣的“风”就有160篇。谣谚的史料真实性决

定了谣谚作为正史的补充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谣谚的史料性也逐渐为更多学者认同。可以说将谣谚引入史学研究，也是一次扩展学术研究视野的革命。

（二）民俗性

民俗学这一概念，原是周作人从日本引入的，有人曾将其译为“谣俗学”，有人则译为“民情学”。说法虽略有区别，但都明确表明一点，谣谚与民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代设乐府采集民间歌谣的目的之一便是“观风俗，知得失”。左思在《三都赋》中说：“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也反映了民间谣谚的民俗价值。

《史记》中所引西汉谣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汉社会风尚。如果把《史记》中的汉代谣谚比作一面镜子，它可照出西汉社会的世俗百态。《史记》也往往是借助谣谚来说明当时社会状况。有人专门对《史记》中的谣谚进行研究，认为《史记》中所保留的大量谣谚不仅使史学记录的语言增色，而且谣谚紧贴时代脉搏，能敏锐地反映时世的兴衰，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对谣谚的运用无疑增强了《史记》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当时民众的心声。

社会民俗性是谣谚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因而在民俗研究中，谣谚是支撑社会民俗史研究的最为坚实可靠的史料来源。同时谣谚涉猎内容的广泛性也为民俗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课题。关于谣谚与民俗之间的关系、谣谚的民俗性有专题的论述，此不赘述。

（三）文学性

谣谚作为来自于民间的最生动和最真实的语言样式，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对文献及现代考古材料的研究证明，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独立的起源。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单就文学方面来说，从《诗经》以后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看，与印度、古希腊等其他文化类型的成熟文学比较起来有着明显的不同内容、风格和气质，但作为中国

古代文学的发育期的史前时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诗、乐、舞的一体化；审美愉悦功能与实用功能的统一；现实生活价值取向与原始宗教祭祀巫术活动的混杂等许多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圈相同的特征。虽然史前时代的早期文学有很多共同点，但之后的不同文化圈之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考查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问题时，我们可以大致将口头流传时代与文字记录时代区别看待。尽管我们可以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方法，通过对仅存下来的原始文化的活化石——所谓未开化民族的人文调查来验证、推测早已逝去的口头文学时代的历史面貌。

最早的文学活动应该是有文字之前的口传的歌谣及神话、祝词、咒语等等。谣谚作为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形式之一，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珍贵资料。例如《礼记·郊特性》记载的伊耆民《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以及《易经·爻辞》中的“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等。

从谣谚的文学性中我们可以看出，谣谚有以下特点，首先是抒情主体的不同，反映出抒情风格的差异。虽然谣谚源自里巷，但是随着人们对谣谚社会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不少谣谚甚至童谣，并非天籁自鸣，很多也是源自文人或者是统治者之手。在用词和语言风格上的文学差异，在谣谚中表露无疑。以《诗经》为例，《诗经》中人们公认为《风》是言“情”的里巷歌谣；《雅》和《颂》则是朝廷的庙堂乐歌。《风》的作者多为里巷男女，而《雅》《颂》则为文人官僚。因此在谣谚的表达中，由于抒情主体的不同体现了迥异的抒情风格。

其次谣谚讲究韵脚和节奏。以三言诗为例，三言诗作为古代诗体之一，自汉代到唐代，陆续有作品涌现，依其用途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在庙堂之上，作为雅乐的歌辞，祭祀天地、娱神祭祖时候咏唱，此为三言诗的主流；第二类是在民间作为徒歌形式的谣谚而存在，或总结生活中

的经验教训，明理箴言，或是表达民众对执政者政治措施的讽刺，或是对于政治事件发展趋势和结局的预测，也即多以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谶。第三类则是文人抒情类的创作。

三言诗作为大众性的诗体，在民间盛行不衰，这类体式与语言简易浅近，琅琅上口，音韵简单，节奏紧凑，为大众所接受。三言形式的谣谚内容丰富，流传甚广。

格言类谣谚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还有“促织鸣，懒妇惊”等。

政治美刺类的谣谚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都骑尉；烂羊头，关内侯。”此外还有：“王世容，治无双；省徭役，盗贼空。”

谣谚在民间是不用配乐的徒歌形式，其节奏短促紧凑，大致配合鼓点单纯的韵律。徒歌谣谚虽然没有乐器相伴，但是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以脚步之声作为歌咏的节拍，即所谓的“踏歌而行”。因此谣谚对于韵律和节奏的要求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在这一点上，谣谚为以后的诗歌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四）大众性

谣谚是最为贴近人们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谣谚的大众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谣谚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二是谣谚反映的内容大众化。

谣谚创作的主体大众化是指谣谚多为民间创作，作者只是平民百姓，他们并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和很丰富的学识，但是他们可以运用谣谚这种形式有感而发，直抒己志。很多流传至今且文学和艺术价值很高的谣谚，我们无法追踪其作者为何人，可以说谣谚的创作主体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谣谚民俗的大众性还表现在谣谚的语言平实如话上。如前所述，谣谚语言文字的平易和直白是其基本特点之一，这种平实更多地源自于谣谚的口头创作和口耳相传。故谣谚才被当做民